

凭窗读史

秦腔与贵阳的一段佳话

孙凤岐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秦腔这一古老剧种一夜之间走进千家万户。那高亢嘹亮、激越悲壮的曲风和地道浓郁的陕西方言，直抵人心，大呼过瘾。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秦腔就翻越秦岭落户贵阳，至今已二百多年。

乾隆45年（公元1780年）乾隆下旨云：“兹据伊龄阿复奏……查昆腔之外，尚有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这便是秦腔人黔最早的记载。

乾隆、嘉庆年间，秦腔在贵阳一带颇为盛行。据史料记载，当时贵阳的秦腔演出非常火爆，“豫升班”等戏班常在娘娘庙（护国路指月街一带）等地连场演出《烤火·下山》等戏，吸引了大量观众。豫升班是贵阳历史上的第一个职业戏班，演出剧目多，演出阵容强大，它将秦腔在贵阳的演出推向了高潮。

当时的贵州藩台李宗昉在《黔记》收录的《贵阳竹枝词》中生动描绘了当时演出的火爆场面：“板凳条条坐绿鬟，娘娘庙看豫升班。今朝似比昨朝好，烤火连场演下山。”这寥寥数语，勾勒出了一幅极具烟火气的市井观戏图：娘娘庙前，长条凳上坐满了盛装打扮的观众，人们争相观看豫升班连场演出的秦腔经典剧目《烤火·下山》。简单来说，豫升班当时在贵阳的演出场场爆满，好戏连台，一票难求。这一盛况，印证了秦腔在贵阳戏剧舞台上的绝对统治力。用当时的网络语言，秦腔在贵阳一度火爆出圈。

电视剧“主角”中男旦苟存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贵阳也有一个男旦，名叫杨宝儿。据清代戏剧评论家吴太初《燕兰小谱》记载，当时年仅十五岁的贵阳籍秦腔艺人杨宝儿便已登台献艺，其“素儒娇憨，有柔媚媚人之态”，很受观众欢迎。

杨宝儿年幼时离乡背井去到京城，跟秦腔大师魏长生学习秦腔，由于天资聪明，再加上勤

学苦练，深得秦腔要领。趁每年回乡时，他还与贵阳的秦腔同行交流技艺，并将自己学到的秦腔剧目和梳水头（帖子）、踩跷履等特技传授于人。乾隆年间贵州学使洪亮吉在他的《洪北江全集》中，记有观戏诗文，其中一句“束素腰纤点履高”，可以证明魏长生独创的秦腔特技和剧目，已通过杨宝儿传入贵阳。

杨宝儿是清代乾隆年间一位极具才华的秦腔青年艺人，也是贵阳历史上见诸记载的早期著名戏曲演员。年幼成名，轰动京城，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他的扮相清新自然（素靺），既带有少女的娇憨，又有一种独特的柔媚气质，非常讨喜。当时的文人诗作形容他“菰菉听嘶燕喃喃，颦齿迎人媚态含”，其嗓音清脆悦耳，表演细腻传神，能够生动地刻画出女性角色的娇羞与可爱。

代表剧目《烤火》是秦腔《富贵图》中的一折，杨宝儿饰演女主角殷碧莲。这出戏在当时的贵阳极为流行，据史料记载，贵阳的戏班曾连场演出此戏，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秦腔并未在贵阳孤立发展，而是与本地民间音乐、民歌小曲以及后来传入的弋阳腔、楚调等声腔相互交融。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吸收，最终孕育出了独具地方特色的“贵州梆子”。从咸丰、同治时期的“豫升班”“万和班”，到后来的“泰洪班”“隆庆班”，贵州梆子戏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上世纪50年代初，贵州扬琴艺人就曾用扬琴曲调为秦腔剧本《穷人恨》配曲，道白使用贵州方言，很受欢迎。在扬琴基础上形成的文琴戏曾吸收过贵州梆子的部分锣鼓经和表演身段，以丰富的舞台表现力，开创了黔剧的先声。

秦腔在贵阳的发展演变，是一部跨越数百年的戏曲交融史。从明末清初传入贵阳，到与



《烤火》剧照。

本土文化融合孕育出“贵州梆子”，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新兴剧种“黔剧”的启发，以及当代作为文化交流名片频频亮相，可以说秦腔与贵阳有不解之缘。

回望历史，秦腔在贵阳的流传不仅是一段戏曲传播的佳话，更是贵阳城市文化包容与创新的缩影。它从北方的粗犷豪迈，逐渐浸润了西南的温婉细腻，最终化作滋养黔地艺术的甘霖，为后世贵阳戏剧舞台的姹紫嫣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戏韵悠悠入影来

黄玉迎

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的开山鼻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里，更是经典辈出，还曾创下电影界的票房奇迹。

周总理海外“推广”戏曲电影

中国的戏曲与电影有着天生的不解之缘。20世纪初，当外国影片涌入中国之时，力挽狂澜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就是戏曲电影。这部《定军山》由“伶界大王”谭鑫培出演，影片上映时，观影人潮汹涌，蔚为壮观。首开中国电影先河的戏曲电影，对当时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电影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别，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摄制完成。这部影片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香飘海外。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的就是这部影片。周总理还让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在请柬上只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晚的电影招待会座无虚席，观众们“人戏太深”，散场后仍不舍离去。在放映后的鸡尾酒会上，许多英国、法国和西德的记者都表示，中国电影把民间戏剧搬到银幕所体现出的中国民间艺术的优美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水平，令人印象深刻。

上世纪50年代，戏曲电影始终在电影界占有重要分量。以1956年为例，在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直属各制片厂生产的40部艺术片中，就有《宋士杰》《十五贯》《搜书院》等多部彩色戏曲电影。1958年，在推选一九五七年最受欢迎的一部国产影片活动中，观众投票选出了两部最受欢迎的戏曲电影：《宋士杰》和《李二嫂改嫁》。令人感动的是，有观众因为《李二嫂改嫁》的12月上映而担心它会选不上，于是写了很长的信，把它和别的戏曲电影作对比，说明它是一部优秀影片，要求报纸和电台推荐它。由此可见人们对优秀戏曲电影的热爱之深。

获“百花奖”成香港“片王”

上世纪60年代，戏曲电影好戏连台，不仅在首个全国电影大奖“百花奖”中获得殊荣，而且还在香港成为创影院满座纪录的“片王”。

1961年底，为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大众电影》杂志在北京创办“百花奖”。这种全国性的群众影片评奖活动，当时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百花奖”的设置，其中就包括最佳戏曲片奖。

第一届“百花奖”的评选共收到电影全国选票117939张，参加投票的观众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战士和农民，还有远在外国的10多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作人员。1962年，首届“百花奖”影片评奖结果在北京揭晓，《杨门女将》荣获最佳戏曲片奖。

这部1960年上映的戏曲电影，将爱国主义思想与优美艺术形式和谐统一，故事既家喻户晓，情节又极为动人，文做武打都非常精彩，一上映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观众反映，即使是不懂京戏的人，也能从头到尾看得津津有味。这部影片在香港放映时也是盛况空前，被评为“十大名片”之首。香港《大公报》报道影片上映盛况时说：“《杨门女将》创下了香港影院满座最



戏曲电影《红楼梦》剧照。

持久的纪录，成了香港空前的越映越旺、百看不厌的片王。”1962年，《杨门女将》在新加坡上映时同样受到热烈欢迎，观众近19万人次。不少观众一看再看，有的甚至看了三四遍仍念念不忘。

1963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获最佳戏曲片奖。这部1962年上映的新春贺岁片，在“南猴王”六龄童章宗义等演员的精湛表演下，加上电影特技的巧妙运用，生动展现了《西游记》原著的传奇神话，轰动了全国，还发行到72个国家和地区。充满诗情情怀的毛泽东主席不仅看了两次影片，还观赏了六龄童演出，写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豪放诗句。

上世纪60年代，戏曲电影让不少观众养成了过春节看电影的习惯。各大影院的工作人员为了让观众能准时看到喜爱的影片，常常要在寒风中蹬着自行车争分夺秒地接力跑片。在我国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少不了它的身影。如1964年我国大使在平壤举行的招待会上，就放映了彩色戏曲电影《野猪林》。

戏曲电影界的“茶馆”问世

改革开放后，戏曲电影的发展不断出现新高潮。其中打头炮的，是1978年复映（1963年首映）、成为现象级作品的越剧电影《红楼梦》。那时《红楼梦》在全国36家电影院24小时连放，四年票房总收入达到2亿多元。过亿票房在今天也并非易事，而当时人们的平均月工资仅36元，更凸显了这部电影的风靡程度。当时有北京观众连看二十多场仍看不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唱段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上世纪80年代，《七品芝麻官》《李慧娘》《杨三姐告状》《升官记》等许多新拍戏曲电影都深受人们喜爱，戏曲电影的摄制也超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最高年产量，1983年达到15部。1984年，拍成电影的戏曲剧种已达六七十种。其中数《五女拜寿》最为吸睛。越剧《五女拜寿》1983年作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开山之作，相当于《茶馆》之于北京人艺的地位。拍成《五女拜寿》戏曲电影后，一举获得1985年大众电影“百花奖”。这一年也是“百花奖”第一次把



获1985年“百花奖”的戏曲电影《五女拜寿》剧照。

奔赴大学百年前考生的投考路

纪习尚

又是一年高考时节。如今的考生走进标准化考场，只需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应试；而在近百年前，大学招生却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全国尚无统一高考，各高校独立命题、自主招生。为了踏进大学校门，年轻人不仅要搜集纷繁复杂的招考信息，还要携带材料，辗转各地参加考试，在时间、金钱与体力的多重考验中争取一纸录取通知。

报端寻讯 确定目标

当时，报纸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五六月份开始，各高校开始在报纸上密集刊登招生广告，吸引考生报名。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往往排满了“××大学招生”的黑体广告。招生广告一般分为五部分：一是招考的学系及年级（一年级是新生，其他年级是转学生）；二是报名日期，考生在这个时间段内报名，过期不候；三是报名地点，为了方便外地考生，一般在数个大城市设置报名点；四是考期及地点，告知正式考试的时间及地点，一般在哪个城市报名，就在哪个城市考试；五是附注，包括报名费的多少，招生简章如何索取等。

比如1933年6月19日天津《大公报》头版，有国立山东大学的招生广告。该校在中国文学系、数学系、化学系等学系招收一年级生，在物理学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学系还招收二年级转学生。有意愿的考生可于7月18日—21日在青岛、济南、南京、北京等四个城市报名，报名后三天在上述城市考试。

为了吸引优秀考生报考，有的学校还特设奖学金。如南开大学1933年设立特种奖学金，资助20名“清寒”学生，每人每年350元；另设立学科奖学金，鼓励4名算学专门人才，每人每年300元。在当时，这些奖学金已相当优厚，足够覆盖学生一年的学习和生活。

择校指南 做题备考

除了报纸这一主要渠道。各书局还出版了专门的报考指导书。有的指导书内容全面，就像一部招考百科全书，包括高等教育法规、招考规定，如《大学组织法》《严格规定招考学生入学资格》《勿投考未经教育部核准设立及立案之私立学校》等，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如何报名，怎样准备考试，口试、体检中要注意的问题等。

有的指导书，专门搜集考试真题。各高校数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九门主要课程，历年的考试题目及详细解答，都分门别类登载。比如上海新生书局的《大学投考指南》，国文一科就选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23套试卷。考生可以有针对性地选做，提前了解自己报考学校的出题风格。

还有的指导书，逐一介绍全国重要的公立、私立高等学校，并从经济负担的角度，分析各高校的收费情况。比如《投考专科以上学校指导》，统计了70所高校的学费、宿费、杂费、实验费、图书费、讲义费、体育费等费用。每年除了饭费、服装费外，国立大学约需20至30元，私立大学多至80元。费用是影响考生选择的重要因素，考生们翻翻这些表格，能大体决定报考哪些学校。

升学指导 汇编参考

不管是报纸还是书籍，提供的投考信息都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能提供面对面的指导，那是再好不过了，一些教育机构也看到了毕业生们的需求。1936年，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从7月1日起的两个月，试办升学指导活动，给面临升学的读者提供投考便利。活动的主要内容，一是按照办学性质及所在城市，陈列各高校的概况一览、招生章程、入学指南等；二是搜罗各报纸杂志刊登的考试试题，编为目录；三是汇编各考试科目的参考书，印制成单行本，考生可按图索骥；四是每周朗读指导播音时间，广播有关升学方面的节目；五是图书馆问事处解答考生关于升学的问题。

不过，这种活动虽然也有口头回答的成分，但与现在的学校招生人员直接回答考生问题的现场咨询会，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那个年代，这已是很大的形式创新了。

考前体检 选择考点

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是报考的基本条件，20世纪30年代，政府逐步推行中学毕业会考制度，考生须取得会考成绩及毕业资格，方可报考高等学校。

有些大学还有额外的报名条件，以筛选出优质生源。比如国立交通大学，报名时除要求呈验毕业证书这一基本操作外，并需要所在中学校长填写介绍书直接寄到大学，这就杜绝了假造推荐书的可能。有的大学还需要预先检查体格，报考清华大学的齐佩瑯，到达考点后，发现需要先体检。医生检查得非常仔细，不少人因为色盲等原因，不允许报考，只能黯然离去。



上海新生书局的《大学投考指南》。

每所高校报名时，要收取2至4元不等的报名费。而且，各高校一般选大城市中的数个，举行考试。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的有志青年，只能长途奔波，辗转多地。虽然考生可以多报几所学校试试，但在时间、费用面前，往往也只能选择其中的2到4所。

投考之路 艰辛备至

一些成功被录取的考生，在杂志上发表过他们的投考之路，读来感觉艰辛备至。

1924年，考生马永祯7月13日从山东青州出发，坐胶济、津浦铁路火车，辗转到达天津，18、19日两天参加北洋大学考试。次日，搭乘京奉铁路火车到北京，参加北京大学的招考。8月8日，经过体检、初试、复试后，马永祯从2300多人中脱颖而出，幸运考中北大。这次投考，耗时一月，花费50元，成本很高。

1934年的《中学生文艺》上，考生王天佑讲述了他的北京投考经过。考试那天很热，没有一丝风，早晨5点，公寓的伙计就将他喊醒。王天佑匆忙起床洗漱，拿上笔、墨盒赶往考场。这时，考生姓名、座次已经张贴出来，名单足足有一丈五寸长。1300人报考，只录取200多人，竞争实在激烈。8点钟开考，王天佑拿到了油印的试卷。头上风扇低旋，前后左右站满了监考人员，前面还站了一排，气氛非常紧张。

防范如此严密，第二天考数学时，还是有两个穿西装的考生，因为作弊被请出考场。还有一位穿红衣服的女生，可能是因为题目答不出，低头哭泣。初试结束后，800人被淘汰。王天佑最终通过了复试、口试、体检，成了200多个幸运者中的一人。

1937年《大学声》杂志，张修平介绍了自己在半个月里参加四所大学的考试，忙碌地在各个考点之间赶场子，最后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的故事。张修平考完清华大学后，紧接着参加交通大学的考试。题目比较难，他在物理科目时发生了状况，八题只答了两题，肚子突然痛起来。这时开考还不到一小时，但没办法，他只能提前交卷。物理考砸了，次日一大早，他挣扎着要不要参加后面的考试，最后决定坚持参加：一场失败，并不代表全盘皆输。随后，他又参加了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张修平的不放弃得到了回报，几天后，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被交大、浙大同时录取的消息，清华大学也来了一封快信：“总分够，可以录取，但物理不到40分，只能读文理学科，不能读工科。”

青春列阵 郑重出发

有人感觉辛苦，也有人乐在其中。齐佩瑯后来在北大东斋，回忆了自己考上清华、北大的经验。她先参加清华的考试，几日后接着考北大。每考完一场，他感觉“身上都有说不出的轻松”。

齐佩瑯特别介绍了北大受通学高分的诀窍：当时北大国文试题多受胡适文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影响，齐佩瑯因此特别建议考生阅读《胡适文存》等著作，比如《胡适文存》中的《国语文法概论》《吾我篇》等。时还要多了解胡适的方法论，比如某年胡适出了一道语法题：“为什么说我们、你们、他们、朋友们、同志们，而不说桌子们、椅子们？”事后，出题人胡适对学生们说：“这个小题目答对的很少，其实用归纳的方法一比较，就可以很快地看出，‘们’是代表人称代名词的多数，古时用‘辈’‘侪’等字。”

回望过去，今天的考生，只需轻点手机屏幕，便能完成报名、查询和志愿填报；而百年前的青年们，为了一纸准考证，往往要跋涉千里，辗转数城。时代改变了考试的形式，却没有改变年轻人追求知识、改变命运的热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当年的“投考”，还是今天的“高考”，都是青年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郑重出发。